

钱穆〈论十翼非孔子所作〉平议
On Qian Mu's Ten Arguments Against Confucius'
Authorship of the *Yizhuan*

徐威雄*
(SER Wue Hiong)

摘要

孔子与《易传》的关系为如何，为中国学术史的一大公案。此议题从民初论辩至今，尤以钱穆的“孔子与《易传》无关”说，在论证上最具系统也最全面，故对学界的影响极大，至今不衰。本论文旨在对钱氏所提的十条论点及其论据作深入检验，结果发觉这十条证据都存有破绽与可疑之处，因而对其结论有所保留。

关键词：钱穆、孔子、《易经》、《易传》、孔子与《易》的关系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and *Yizhuan* (Commentaries on the *Yijing*) has been debated by scholars for a long time. Of all, Qian Mu was the first one systematically proposed that *Yizhuan* is irrelevant with Confucius during the Mingguo period. Since then, his point of view greatly affects *Yijing* Studies until toda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eply reexamine Qian view's ten textual evidences and arguments. It is concluded that Qian's belief is in fact invalid and therefore the related conclusion should be doubtful.

Key Words: Qian Mu, Confucius, *Yijing*, *Yizhuan* (Commentaries on the *Yij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us and *Yizhuan*

* 徐威雄博士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讲师。电邮地址: wuehiong@yahoo.com

一、前言

孔子与《易》的关系，为清末民初以来重大的学术公案，这个论辩牵涉到对儒学甚至先秦学术史的诠释，今天仍有讨论的价值¹。

依传统说法，孔子与《易》有着密切关系，《史记》记他五十以学易，思想另开一境地，晚年叹道之不行，返鲁赞易垂教，《周易》遂成为儒经之首。然而自宋儒欧阳修始疑〈系传〉、〈文言〉非孔子所作，清代崔述等再疑《易传》与孔子无关，旧说愈受挑战。至民国20年代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周易》便成了辩论焦点。按照顾颉刚说法，辨《易》是为了“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顾颉刚1992：1）。至此，《易》的崇高地位动摇，与儒家的关系也宣告断绝。《古史辨》第三册辑录了顾颉刚、钱穆、李镜池、余永梁等的翻案文章，基本结论是孔子与《易》没有关系，有的还认为与儒家也无关，这观点几乎笼罩当时学术与文化界，并影响至今²。

今天虽有持平看待此议题的学术环境，又有出土文献可作补证，但因疑古影响深远，即连帛书《易传》也不敢轻信³。本文论旨，并不在证成孔子与《易》的关系如何，而是要重新检讨民国学界否定孔子与《易》有关的论据。此议题以钱穆倡导最先、最力、最全面，其作〈论十翼非孔子所作〉⁴，综合清代以来的十大证据，并作系统论证与发挥，最具代表性，可视为主此说者的共同意见⁵。这里以此文为讨论基点，就其说法作逐条检讨⁶。先节录原文，后进行讨论。

二、对十条论据的评论

¹ 本文原本是2005年博士论文初稿的其中一章节，后因故未收入论文定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5）。今单篇抽出成文，语境有所不同，故文字略作修饰，但内容与论述基本一致。

² 除《古史辨》第三册外，当时各家的辩论文章，多被收入黄寿祺编（1987），不一一引述。

³ 今学界全面质疑〈孔子与《易》有关〉说的，除了陈鼓应等人“道家《易传》说”外，笔者所见，有朱晓海（1986）、何泽恒（2000）等文。

⁴ 此文本为1928年钱穆（时34岁）应邀省立苏州中学作“易经研究”演讲的部分内容，并刊载于《苏州中学校刊》之十七、十八期上，1929年复转载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七集第八十三、八十四合期上，至1931年此文被顾颉刚收入于《古史辨》第三册中（参阅顾颉刚的说明，1992：89）。后来钱氏汇集相关学术史论文出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系列，此文收入该丛书第一册，属〈易经研究〉的部分内容（钱穆1994：262-269）。本文所引全据此本，不再作说明，只注其页数。

⁵ 廖名春考论钱穆“孔子与《易》无关”说的由来及后续，指出这是钱穆“贯穿一生”的坚决主张，至终不稍改其意（廖名春2004）。又郑吉雄则从当时学术界的脉络来论钱氏此文的影响及意义（郑吉雄2004：215-247），皆可参看。

⁶ 对于古史辨诸家的说法，当时及稍后学者有过论辩，其中以张心澄的辩驳最详细和具系统（见张心澄n. d.），后来徐芹庭也曾撰文逐条反驳，但较为简略（徐芹庭1983），皆可与本文合看。

其一：从前晋朝在河南汲郡魏襄王的古墓里得到大批古书，内有《易经》两篇，与现在的《周易》上下经同，但是没有十翼。我们知道魏文侯很能尊儒好古，他奉子夏为师，子夏是孔子门下大弟子，倘孔子作十翼，不应魏国无传，何以魏冢《易经》仍止两篇？（钱穆1994：262）

从晋朝汲冢魏襄王墓中所得《易》书来认定孔子不曾作《易传》的说法，此清朝姚际恒已说之，后郭沫若等复倡之，成了广为援引的证据。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看看最早的相关文字。此事首见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后序〉，其文为：

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杜预）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

（阮元校刊1993：1063）

当时的束皙为整理这批汲冢竹书的主事者，所以《晋书》将此事系于其传下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

（房玄龄等1974：1432-1433）

从上面两段引文可知，汲冢古书的发掘乃是因为先被不准所盗，然后才被充公归政府所有，这是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说，竹书在盗墓过程中是否有折损或被遗弃的？盗墓者是否有私藏一部分？而从“得竹书数十车”到最后仅剩“大凡七十五篇”，这中间掉漏了多少？还有，“竹书发于咸宁五年（179A. C.）10月，明年3月吴平，遂上之”（雷学淇2000：108），这五个月的空档时期，又值伐吴的荡板之际，是不是有散佚之虞？这些今天都已无从得知了，但却是必须考虑进去的重要因素。即使在今天，上海博物馆购得盗墓者所发的巨量楚简，也不敢保证这一定是墓冢中如数无缺的原有竹简。我们看杜预就说得很清楚：“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这已是第一层的折损了；后来在整理解读中，又“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这又是第二层的折损，何况到最后还有“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者？这无疑在提醒了我们，晋室秘府里所藏七十五卷并不是悉数原有的，那么欲由此七十五卷中不见《易传》而推断那时没有《易传》，这是不是太草率了些？而且还要推得更

远，欲由此来推断孔子必然与《易》无关，那岂不更渺茫了吗？

更况且，〈束皙传〉中说“〈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这是否与《易传》有关，不可得而知。然而杜预说简书《易》“无〈彖〉、〈象〉、〈文言〉、〈系辞〉”时，就少举了〈说卦〉，他是不是把〈卦下易经〉当作〈说卦〉来看待？这不能说没有可能（见李学勤1992：184）。再进一步说，即有〈卦下易经〉，也应当有〈卦上易经〉吧？这应该是合理的推测。而作为陪葬品，上下篇应该是合齐下葬的，相信这也是合理的推测吧。然而在所见七十五卷中，只有〈卦下〉而没有〈卦上〉，这是不是意味着〈卦上〉在盗墓时就已损弃了，或者它就在那折坏的七篇中？准此推论之，其他《易传》部分会不会就在那些损弃或折坏的竹简中呢？这当然没有办法证明，但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至少也应保留其可能性。

总之，这里要强调的是，历史研究有条经验法则——说有容易说无难——也就是说，我们只能从所见汲冢简书中确定当时已经有了什么，但很难判断当时必定没有什么。这是再平常不过的观念了，却正是古史辨学者所常犯的毛病⁷。

所以，要用“汲冢无《易传》”这条论据来论断孔子与《易传》无关，显然是无效的。

其二：《左传》鲁襄公九年鲁穆姜论“元亨利贞”四德与今〈文言〉篇首略同。以文势论，只见是《周易》钞《左传》，不见是《左传》钞《周易》。（钱穆1994：263）

按《左传》所载穆姜言“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今传本〈文言〉亦有此文，大同小异。由穆姜先说而断〈文言〉非孔子所作，此说盖本于欧阳修《易童子问》，其文曰：

童子曰：“敢问四德？”曰：“此鲁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随，而为‘随，元亨利贞’说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数十年而始赞《易》。然则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为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谓左氏之传《春秋》也，窃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说，是左氏之过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为而传《春秋》，岂不欲其书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书，为孔子未生之前之说，此虽甚愚者之不为也。盖方左氏传《春秋》时，世犹未以〈文言〉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则谓〈文言〉为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

（欧阳修2001：1122）

⁷ 当时张阴麟就曾批评顾颉刚等的“古史层累造成说”，说他们的方法十九皆以“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来推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某时代无此观念”，故其结论往往出错。其论极允当，可参考之（张阴麟1982：272）

欧阳修的推论看似极有道理，但细思则不然。他其实已经先假设了“四德论”是创言于穆姜，所以〈文言〉必然是抄自穆姜之言，殊不知《周易》在春秋时代已出现不同的解《易》文字，有讲德义，也有讲占卜的⁸，穆姜只是援引之，而后来孔子赞《易》亦采而修之，此义朱子已发之：

此第一节，申〈象传〉之意。与《春秋传》所载穆姜之言不异。疑古者已有此语，穆姜称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别以“子曰”表子之辞。盖传者欲以明此章为古语也。

（朱熹1999：33）

以“子曰”判出前后文字的来历不同，甚有见地。也就是说，“元亨利贞”四德说本为古语，穆姜与〈文言〉作者各别采用之，而非必然〈文言〉抄自穆姜，也无法证明孔子与之无关。

民初易学家尚秉和对此问题进一步补充，值得参考。尚氏在注“四德”时说：

盖此八句（指〈文言〉四德论），为最古之《易》说。……然穆姜即述之，可见其为旧说，故孔氏复述之。而欧阳公谓左氏著书，亦欲信今传后，若本孔子之言而以为穆姜，其谁传信之？谓〈文言〉非孔子作。按左氏所纪古人言行，皆古人实有是言，有是行，而后纪之。非并无是事是言，尽左氏所造作也。观穆姜述是语已曰“然故不可诬也。”即谓古《易》说之可信，而不我欺也。且《周易》之兴，至春秋已数百年，所传古训，必已多矣。然则穆姜述之，孔氏复述之，事之常耳！必谓甲述之为真，乙再述之即伪，似不然也。

（尚秉和1994：11）

尚氏再以“然故不可诬也”语来判断此言是穆姜之前的古语，此辩驳已经很清楚了，这里毋庸再述一言。

其三：《论语》“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周易》艮卦〈象传〉也有此语。

果孔子作十翼，记《论语》的人不应误作“曾子曰”。（钱穆1994：263）

这个说法出自崔述，常为后人援引，成为重要依据。再加上另一章：“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其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是《论语》明确转引《易》文的两章，但因为没有注明“《易》曰”而备受质疑。钱玄同就说这两章不特不足以证明孔子赞《易》，且反足以证孔子与《易》无关。

然而，以“君子思不出其位”为曾子所说而不是“子曰”或“《易》曰”，并不能证明〈象传〉必抄自《论语》，或孔子未曾学《易》。这是认定古人在转引古书时，必如今人般说明其出处，以为征信。实不知这是后来的观念，许多典籍在当

⁸ 有关孔子之前已有解《易》义理的文字，具体讨论可参考徐威雄2007：40-48。

时深具文化意义，为社会上所共论，当时人莫不熟稔于胸，随口而出，引经据典，即使不言出处，听者亦能明白。章学诚说：“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章学诚1980：105）便是此义。张心澄早已引章学诚的话来辩驳过了，他在讨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章没有“《易》曰”时说：

按此点可以章学诚之语解之。章氏曰：“《论语》则记夫子之言矣，‘不恒其德’，证义巫医，未尝明着《易》文也；‘不佞不求’之美季路，‘诚不以富’之叹夷齐，未尝言出于《诗》也；‘允执厥中’之述尧言，‘玄牡昭告’之述〈汤誓〉，未尝言出于《书》也（《墨子》引〈汤誓〉）。《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诗》、《书》初无识别，盖亦述作无殊之旨也。”（《文史通义·言公上》）据此，则《论语》此二句无‘《易》曰’二字，不足为异。以此推之，崔述及钱氏（玄同）以‘君子思不出其位’不云‘《易》曰’，而云‘曾子曰’，疑为作〈大象传〉者袭曾子语，亦不成问题。⁹

（张心澄1991：75）

张氏对这问题做了很好的答复，这里不再论述，仅作一点补充。《论语》把艮卦〈象传〉记为“曾子曰”，古书多有此书例，不足为奇，例如《汉书·艺文志》载：“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在《论语》中，此章却明记“子夏曰”，这可能在转述间有所出入，然其同为孔门之言，则有何疑问？（见徐芹庭1983：54）

其四：〈系传〉中屡称“子曰”，明非孔子手笔。（钱穆1994：263）

此说亦发于欧阳修，但不知道有何问题？即使确实非孔子亲笔，就不可能是孔子讲述之义吗？朱熹早就作过解释，他说：

他（〈系传〉）所谓‘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后来施添入，亦不可知。近来胡五峰将周子（敦颐）《通书》尽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个‘周子曰’，此亦可见其比。

（黎靖德1986：1675）

可见这实在是古人的习惯，并不足为奇。即使欧阳修自身也还不是如此？我们看章太炎对他的辩驳，章氏说：

欧阳修经学疏浅，首疑〈系辞〉非孔子所作，以为〈系辞〉中有‘子曰’字，决非孔子自道。然《史记》自称太史公曰，太史公下腐刑时，已非太史公矣，而〈报任少卿书〉犹称太史公。即欧阳修作〈秋声赋〉，亦自称欧阳子，安得谓《史记》非太史公作，〈秋声赋〉非

⁹ 张氏此段文字于修订版有所修改（张心澄1991：100），文字更为简略，但内容实质大体没变，这里取其初版文字，是为配合本文的行文脉络，无特别用意。

欧阳修作哉？商瞿受易之时，或与孔子问答，退而题‘子曰’字，事未可知，安得径谓非孔子作哉？

（转引自林尹1981：7）

连欧阳修自己都自称为“欧阳子”，此盖古人的作书体例可知矣。民初顾实对此疑问也已指出：“孔子作十翼称‘子曰’者，犹司马迁作《史记》亦自称‘太史公’也。”其下又自注曰：“此是古人著书通例，有因此而疑十翼非孔子作者，不思之过也。”（见顾实1987：13）良有以也。

简单来说，古书的出版并不能用今天的出版情况来衡量，盖如李零所言：“古书从思想酝酿，到口授笔录，到整齐章句，到分篇定名，到结集成书，是一个长过程。”（李零1988：112）在结集的过程中，老师与学生的言论时而混杂，而所谓“作”不一定是亲书，也可能是弟子整理师说而归之于师名下，此实无异于“作”。盖在当时人视之，“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章学诚1980：108），即使是老师自己的文字，学生有时也会加上“子曰”，以作加强语气或章句分段之用。总之，还是章学诚所说的：“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其五：《史记·自序》引〈系传〉称《易大传》，并不称经，并不以为孔子语。（钱穆1994：263）

此说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来。这问题可从两方面谈，一是所谓《易大传》的问题。张岱年就认为，汉人之所以称孔子所传之易为《易大传》，是为了区分当时多种别家的《易传》，如此则《易大传》之名反而证明和孔子有关了（张岱年1979：122）。再进论之，《易大传》的“大”字，实有推崇之意。如《尚书大传》、如“大一统”、“大哉乾元”等，实皆此义。“传”乃传述“经”意而来，谓其为“大传”，正是推崇极致之意，因为这是圣人之作，此圣人除了孔子以外，大概很难做第二人想。这不正显示太史公心目中的〈系传〉实为孔子所作吗？

又所谓《易大传》不称经问题，此实严重误解。汉人引经传之文，常混同不分，故曰之为“传”，有时又直称以“经”名，以传附经，二而实一，此学者早已详论过（见崔适1995：381；吕思勉1996：67-75）。顾实也说过：“孔子十翼本称传而非经（《史记》自序引‘〈易大传〉曰’可证）。顾总称之曰《易经》十二篇，是传附经亦称经也。（见顾实1987：13）”所论是矣。《易传》之称经，试举两例为证：《说苑·尊贤》记曰：“《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此为益卦〈彖传〉之言，然《说苑》却直谓之“《易》曰”，其经传不分也。又《后汉书·郎顛传》载“经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赵善治注1986：205；刘晔1971：1065）此实为困卦〈彖传〉辞，而《后汉书》反谓之“为经”，其径以传为经亦明矣。于此可见，汉人实将《易传》等同于经，则《易》与孔子之关系，自是密切！

其六：《史记》托始黄帝，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而曰“不离古文者近是。”〈伯夷传〉的起首说：“儒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许由、务光，太史公虽亲登箕山许墓，只以孔子不曾说到，故不敢轻信。列传始伯夷，世家始吴泰伯，多是孔子称述到的人。《史记》推尊孔子如此，今〈系传〉中详述伏羲神农制作，太史公并不是没有见到，何以五帝托始黄帝，更不叙及伏羲神农呢？可证在史公时尚不以〈系传〉为孔子作品。（钱穆1994：263）

以太史公不传述伏羲，而推论太史公不以〈系传〉为孔子作品，这是将两个不同的问题混看，以致有此误判。〈孔子世家〉明明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说卦〉、〈文言〉”，太史公岂有矛盾至此者乎？钱穆大概是认同李镜池的意见：“这段文字若不是错简，定是后人插入。”¹⁰（李镜池1978：299）然而李氏没举任何证据，以致遭戴璋璋斥为“实是臆测之词，没有确证”（戴璋璋1989：14）。更何况太史公在〈自序〉又明确地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1993a：1336）以六艺并列而欲以绍承之，这不就是太史公认为《易传》与孔子有关系的另一条明证吗？后来何泽恒根据钱氏之说，而推测“正《易传》”是指要“订正”当时各家的释《易》文字，可见史公也不以〈系辞传〉等为孔子所作（按：何氏认为史公只承认〈彖〉〈文言〉〈象〉三篇为孔子作）（见何泽恒2000：11-20）。这其实是误读“正《易传》”句的意思，史公这句话是指他要“以《易传》为正”，而不是要“以订正《易传》”，否则这便与“有能绍明世……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上下语境和文意不相合了，其意旨很明显地是指欲依据六经所揭示的理想来重兴文明之世，而不是说要整理典籍文献¹¹。若依此文意来理解，那么此“正《易传》”三字反而最能证明太史公确实以《易传》为孔子所传述的。

再回到钱穆的质疑，太史公为何不依〈系传〉之义，以伏羲为《史记》的开始呢？然则我们是否可以反问，为何《史记》就必须依〈系传〉从伏羲开始呢？这其实是不同性质的两本书，《史记》基本上是撰述可征信的历史，故从黄帝开始；而《易传》意在推衍天地之道，故托以伏羲为创世文明之起点，是取其于文化象征意

¹⁰ 按钱穆只在《先秦诸子系年，孔子五十学易辨》中说：“〈世家〉又谓‘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盖皆不足信。”（钱穆1999：16），但读者（钱穆）不信是一回事，和作者（司马迁）信不信并无关系，两者不能混淆。所以本文只好假定钱穆是认同李镜池的说法（这点也是大部分古史辩学者的看法），相信这不是过分的推测。

¹¹ 有关史公“正《易传》”之义，可参考徐威雄（1996）。吕绍刚〈易学与史学〉亦曰：“‘正《易传》’，是说作《史记》正于《易传》，而不是作《史记》正《易传》。正，应据《论语·学而》“就有道而正焉”的正作解。……‘正《易传》’意思是说，《史记》的基本观点、原则、方法得自于《易传》。”（吕绍刚1997：325-326），所言与本论不期而近同，亦可参考之。

义，而不在意是否真有其人其事上。便何况史公虽然处处以孔子和《六经》为考信标准，但容他也有与孔子意见相佐之处吧，这又有何奇怪呢¹²？由此可见，欲以《史记》不从伏羲为始而判断太史公不信《易传》为孔子所作，进而疑及《易传》非孔子所作，这不仅是无效的提问，而且是个观念混淆的质疑。

钱穆列出以上六条后说：“以上六证，前人多说过，只说非孔子作十翼。现在要更进一层说，孔子对于《易经》也并未有‘韦编三绝’的精深研究，那孔子作十翼的话，自然无根据了。”（钱穆1994：263）也就是说，他认为孔子连《易》也没有研读过，这推论更甚于清人了。以下是其他四条论据。

其七：《论语》无孔子学《易》事，只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条。据《鲁论》，“易”字当作“亦”。古人四十为强仕之年，孔子仕鲁为司寇将近五十，他在未仕以前说，再能加我数年，学到50岁，再出做事，也可以没有大过失了，这本是很明白的话。《古论》上妄错易一字，便附会到“五十学易”等说话。（钱穆1994：263-264）

有关“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的异读问题，可从文本语境、版本流传等问题作检讨，但评论起来论篇幅颇长，此处从略，请见专文¹³，这里仅讨论两点文物根据。一是东汉〈外黄令高彪碑铭〉“恬虚守约，五十以学”铭文，常被引证于“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句读。首先，此铭文是作文章，即使是典出〈学易〉章，但为与“恬虚守约”对文而省字，这是文家通例，不足为奇。而且从押韵上来看，学音效，约音要，正可押韵，若不省“易”字，则全失文章美感。其实，若从严格的校勘学上来说，除非这碑文本来就是专刊经书文字（如东汉熹平石经），才能拿来校勘对证，否则，我们也可据汉朝〈娄寿碑铭〉“有朋自远”句来校正《论语》“有朋自远方来”，说“方来”二字是后人所窜加的了¹⁴。再其次，即就铭文这两句文意来推绎，也只能如苏渊雷所说的，应作“学《易》解。不然，‘五十以学’费解更甚，文意无所着落，岂有待五十始学乎？”（此说见苏渊雷1989：334）此外，徐芹庭也指出，其前句即云“恬虚守约”，这四字恰恰“正是学易的注脚，否则安有年已半百方始入学耶？”这些都是有道理的。（见徐芹庭1983：60）

再来便是1973年于河北定州所出土的西汉《论语》残简，刚好有此章，明白地写作“……以学，亦可以毋大过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1997：33），似为

¹² 例如史公对管仲的评读非常高，将之列于列传第二篇，但这与孔子的意见是有别的，史公还在赞文特别点出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司马迁1993b：831）似乎对孔子的看法有些微言，其崇敬之情可以想见，这和孔子小之的态度很不同。

¹³ 李学勤、郭沂等都有讨论过，最新讨论可参考徐威雄2007：52-57。

¹⁴ 〈娄寿碑铭〉此句碑文见于皮锡瑞《汉碑引经考》卷五（马小梅1967：449）。

《鲁论》的读法添一证。然而单承彬曾作过详细考证，指出定州简本《论语》实即《鲁论》版本（单承彬2001）。此墓主为宣帝朝的中山怀王刘修，其师长禹、萧望之便即是当时的《鲁论》大师，出土文物中尚有萧望之的奏议，很清楚属《鲁论》系统。所以这只能说明《释文》谓《鲁论》“易”字作“亦”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却仍然无法推翻更早的《古鲁》及《史记》的记载，所以这也不是问题。

其八：《孟子》书内常称述《诗》、《书》而不及《易》。今〈系辞〉里有“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的话，孟子论性善也并不引及。荀子也不讲《易》（今《荀子》书中有引及《易》的几篇，并不可靠。）

此说亦为崔述所极力主张，后来成为孔《易》无关说的重要证据之一，今天学界仍然广为引据，以为强证。崔述说：“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彰孔子也不遗余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崔述1984：20）这是典型的以表面有无《易》文或“《易》曰”的文字来作衡量，看似言之凿凿，实则存着极大的盲点。

其实孟、荀不但深知《易》，而且二子书中多处有引《易》文的痕迹，可参考专文讨论（徐威雄2007：235-251），因篇幅极长，此不重述，这里仅指出一二点：我们即使不考虑今本《孟子》已被删去外编¹⁵，也当慎思汉人赵岐〈题辞〉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刘向〈叙录〉谓“荀卿善为《诗》、《礼》、《易》、《春秋》”的意见吧？（焦循1987：7；王先谦1954：366）二氏离战国诸子不算太远，尤其刘向还曾理校过秘府典籍，赵岐也亲见《孟子》内外书，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点参考价值？两千年后的崔述只根据表面文字就能判出相反的铁案，其参考价值竟反比刘、赵二大家的意见来得高？

其九：秦人烧书，不烧《易经》，以《易》为卜筮书，不和《诗》、《书》同样看待。自从秦人烧书后，一辈儒生无书可讲，只好把一切思想学问牵涉到《易经》里面去讲，这是汉代初年《易》学骤盛的一个原因。若是孔子作十翼，《易》为儒家经典，岂有不烧之理。（钱穆1994：264）

以秦人焚儒书，而《易》因占卜以免，故《易》非儒家经典，而推及孔子与《易》无关，此说极倡于古史辨学者，也是孔子（或儒家）与《易》无关的强证，至今还常被视为铁证，反对者也无以回应。然而若细检这条论据，便发觉大有问题在，这里就看看最早的文献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李斯建议：

¹⁵ 例如郑樵《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引《子思子》佚文：孟轲曾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郑樵2000：1713）”这不就暗示了孟子有学《易》的可能吗？

臣请史官非秦记，必烧之；非博士官所识，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司马迁1993c: 117）

我们必须知道，《易》在春秋时已有数术与义理的不同流别¹⁶，孔子传《易》后，《易》便被儒家奉为经典，秦朝焚“《诗》《书》百家语”，《诗》《书》是偏举，可以涵盖六经，《易经》当然也包括在内，这是古书常有的文例，所以太史公又在《儒林传》说：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司马迁1993d: 1253）

即言“六艺从此缺”，则《易》之被焚明矣，可见其举“焚《诗》《书》”当然包括了《易》，这是《史记》直接的内证。后来班固《汉书·儒林传》亦如是曰：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

“六学”便是六艺，可见班氏亦以《易》在焚列之中，再也明白不过了。然而，就在秦令所不焚烧的书籍中，卜筮为其中一种，《易》又同巧有卜筮之用，故得以幸免而传下其书，所以同样一篇的《儒林传》才会在后文这样论汉《易》的兴起：

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

（班固1975a: 3592、3597）

这个“《易》”明显是指筮卜之用的《易》书，而不是儒门六艺的《易》典，因两者同用一个六十四卦的文本，故儒《易》虽被焚，然却幸附于卜筮《易》而得传下，否则《儒林传》在前后仅相隔数段的文字里，竟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矛盾，试想有可能吗¹⁷？我们看《艺文志》数术略中有著龟类，即有《周易》三十八卷，正是此类不烧的卜筮《易》，同样也是《周易》之名，则卦、爻、辞也当大同小异，近年阜阳出土的汉初简书《易》可以为证，其所见五十二卦在卦名、爻题、卦辞、爻辞都与今本《周易》大同，但特别处是“在卦、爻的后边，保存了许多卜问具体事项的卜辞”，从卜病情、婚嫁、产子到逃亡、军旅、出行、买卖等，内容极为广泛（参韩自强2004: 45-46），这不就是“《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

¹⁶ 此义皮錫瑞《经学通论》、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金景芳《学易四种》、戴琯璋《易传的形成及其思想》等皆有言之，最新讨论可参考徐威雄2007: 40-48、116-183。

¹⁷ 后发现高怀民亦有此说：“《汉书·儒林传》言：‘及秦焚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其中‘易’字，指不包括儒门十翼在内的《周易》上下经，即六十四卦象及卦爻解而言，及纯粹用于筮术占断的书，后人也有误解为指儒门《易经》者，由此遂产生儒门十翼在秦火中未被禁的错误认识。”（见高怀民1975: 2）可谓先得我心矣。

绝”这句话极好的实物注脚吗？

此义即明，再来看以刘歆《七略》为本的〈艺文志〉，就能明白了：

……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卦序〉之属十篇。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班固1975b：1704）

注意这里是说“《易》为筮卜之事”，而不是“《易》为筮卜之书”，意即《易》虽被列焚书，却因有筮卜之用而得以传下，而不是《易经》因为以卜筮之书而传下，否则这段文字接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后，岂不非常地令人费解异常？其始即高举三圣观象通德之功，由此开展出文明大道，在文体上可说是立题高远，规模宏大，但如果下句忽然杀出《易》为筮卜之书的结论，这在文脉与文意上说得通吗？可见学者经常引此文为依据，其读书尚隔一间矣。到了后来的《隋书·经籍志》，也还是这个意思：

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¹⁸

（魏征等1935：293）

这里说“《周易》独以卜筮得存”，也是指《周易》书因有卜筮的功用而幸存下来，否则下面那句“唯失〈说卦〉三篇”要如何来理解？这不就说明了作为儒书的《易传》也在烧令之列吗？不然又何须埋藏起来，好故意让后人来个失而复得的惊喜？可见单凭这条证据，就足以说明秦人不烧儒《易》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其十：《论语》和《易》思想不同。这一层应得稍为详述，现在姑且提出三个字来讲：

一、道。《论语》上的“道”字，是附属于人类行为的一种价值的品词。

〈系辞〉上说的“道”却截然不同了。第一，他抽象的独立之一物。……

二、天。《论语》上的天字是有意志有人格的。……〈系辞〉里的天字却大不同……

三、鬼神。《论语》上的鬼神也是有意志有人格的，……

〈系辞〉上的鬼神又不同了，也是神秘的，惟气的，和《论语》上素朴的人格化的鬼神截然两种。

（钱穆1994：264-269。文长，仅录其结论）

¹⁸ 按，这里的“三篇”为误，应据《论衡·正名》“孝宣皇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为是，此一篇《易》佚文即为〈杂卦传〉，可参张岱年的讨论（张岱年1979：122）。又民国以来学界亦多以为〈杂卦〉、〈说卦〉为汉人所造或伪托，然今依萧汉明的研究指出，〈杂卦〉、〈说卦〉显然传自先秦，下限当不晚于战国中期（萧汉明1988：24-29）。

钱穆最后从《易传》与《论语》的思想来推证，以“道”、“天”、“鬼神”三者来对比两者的不同，讨论较为详细，视之为钱穆所自认的强证，亦无不可。后来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承袭此说，继续发挥（冯友兰1933），成为了后来学界否定孔子与《易》有关的重要观念。以下试作检讨。

首先，钱穆以《系传》之“道”为自然取义，是天地间变化之道，是形上与最先的，此不合于《论语》中社会伦常与人生价值之道，故与孔子无关。然则，《系传》里的“道”就没有涵伦常价值之义吗？（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反过来看，孔子不也说过“天何言哉！四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吗？（《论语·阳货》）这和《易传》中天地运行、变化万物的自然之道有何不同？而且还极相合。再说，子贡不也明确指出孔子言“天道”吗——“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这个“天道”不也是形上的终极之道吗？这和《易传》的“天道”又何其契合。钱氏亦引此章，但却说：“孔子时常说及天命，却不敢说天命的所以然之天道。”不知为何作此理解？子贡明明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言者，论说也，因此程子才会解释说：“子贡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既言‘夫子之言’，则是居常语之矣。圣门学者，以仁为己任，不以苟知为得，必以了悟为闻，因有是说。”（朱熹等1935：30）谓其“居常语之”虽倒必未，但孔子有说天道确是事实。他既然有说，则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的闻就不是指耳官之听到，而是指“知道”、“证悟”之义，如同“朝闻道”、“如是我闻”的闻字，这是从语境上便可推出来的。

次谈“天”的问题。钱氏以《论语》的“天”为有意志人格与主宰之义，不合《系传》中以天配地而为自然界两大法象（冯友兰谓此为“义理之天”，又谓为“自然主义的哲学”）。然则《系传》不也记：“《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又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这不是昭昭在上，冥冥主宰之天吗？¹⁹孔子又说“唯天唯大，唯尧则之”（《泰伯》），这不也是有以尧法天地之象的意味吗？故这条论据也应当保留。

再来又以“鬼神”作比较，其谓《论语》之鬼神有意志人格，而《系传》的鬼神为唯气和神秘的，是自然之变化之义。然则《论语》中的鬼神就不神秘？而《系辞》所说的“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文言》谓“与鬼神合其吉凶”、《象传》有“鬼神害盈而福”等句，其曰“天佑”，曰“鬼谋”，“吉凶”，曰“盈福”，这难道不就是属人格意志化的鬼神观么？所以张岱年就认为：“《易大传》对于鬼神的态度是游移的，可以说摇摆于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这和《论语》中所记孔子的态度是一致的。”（张岱年1979：134）其解读适与之相反。于此可见，钱穆所举之证据，皆有商榷之余地。

¹⁹ 《系传》此两章的天为有意志的主宰天（见张岱年1979：134）。

三、结论

总之，我们必须清楚两点，一是〈系辞〉虽有“繁衍丛脞”之嫌，但大体主旨还是相当清楚的，旨在阐发三才之道的思想义理，背后也较有完备的理论体系，《论语》却是弟子随记之言录，虽然经过有意的编辑整理，但两书的性质毕竟不同，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欲拿两者来合证时必须将这背景考虑进去。苏渊雷就认为，在征引《论语》和《易传》参照时，必先审定说者当时之环境及其所与说之对象，然后不致误会²⁰。更进一步说，“性与天道”是孔子晚年的深邃思想，他早已暗示“莫我知也夫”了，还明说“予欲无言”，所以连闻一知二的子贡也感慨“不可得而闻”（具体讨论可参考徐威雄2007：82-93），那么《论语》中少见此类言语（不是没有），不也是很自然且很合理的吗？更何况，这里面还存有一个重要的认知，那就是我们无法把握《论语》是否确实为孔子一生全部言行的完整记录，对此顾炎武早就考辨过，他说：“《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又多大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顾炎武1979：217）可见即连今传本《论语》的佚文就已不少了，更别说那些可能因为碍于书写体例而被编者删去，或者因为“不可得而闻”而没被弟子笔录下来的资料了。

其次，纵使我们不考虑孔子思想有早晚期的变化，也应当知晓从来没有人是“纯粹理性”的。人的思想与感情往往是复杂而多面，虽有其核心思想，但也不妨碍参杂一般的世俗观念，这并不必然构成自我矛盾。冯友兰在“天”字上，以《易传》为义理天，《论语》为入格主宰天，两者泾渭分明，故推出《易传》绝不是孔子的思想，否则“是将孔子陷于一矛盾之地位”（冯友兰1933）。这看来是很合乎逻辑的推理，但却是将孔子浮悬空中，抽离了他的具体行为与生活背景。试举一反三，孟子即说“我之不遇鲁侯，天也。”此天是主宰天；又曰“知性则知天”，此天是义理之天，据此孟子岂不自陷于人格矛盾中²¹？然则此方为真实之人生也。

说到最后，孔子与《易》无关说的背后实有一重要前提，意即孔子最重视讲人伦人事，和《易传》中的发挥天道思想不合拍。但这说法实有一认知当细辨，孔子重讲人伦人事是没错，但是否就代表他不可能会有〈系传〉的“道”的思想？人的思想岂是必然的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乎？学者一般以《论语》为据，但即使检视《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性与天道”（〈公冶长〉）等章，又说“知天命”（〈为政〉）、“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等语，这些话语里难道就没有参证生命终极本体的意味吗？更别说《大戴礼记哀公问》明记孔子说“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之义，又申论“天道”本源（王聘珍1983：11、16），其义与《易传》之“天道”义相符契（具体讨论可参考徐威雄

²⁰ 见苏渊雷对冯友兰的批评（苏渊雷1985：7）。其实，《论语》与《易传》在思想上相通之处不少，苏渊雷《易学会通》、张心澄《伪书通考》等作了不少的引述参照，可参考。

²¹ 此黄彰健对冯友兰说的批评（黄彰健1997：359）。

2007: 82-93)。钱穆最后推出结论说“《易·系》里的思想，大体上是远于《论语》而近于《老》《庄》的。……《易·系》里的哲学，是道家的自然哲学。他的宇宙论，可以说是唯气一元论，或者说是法象的一元论。”（钱穆1994: 269），这实为后来“《易传》为儒、道调合说”所张本，推其极致更成了“《易传》为道家易学说”了，其影响不可不谓深远。

总结以上所论析的，除第一、五、六、八、九条外，其余皆为前人所辨说和驳论过。经过仔细的省辨后，竟发觉此十大论据皆存有疑点，未足为定论。此十大节目既已不立（至少都应当保留），其他枝节自无须抨击矣，则学界所谓“孔子与《易》无关”应当重省了。最近何泽恒尝复议此问题，而谓孔子传《易》乃“汉人所立，宋以下有所破；今欲重立，必复破其所破而后立”（何泽恒2000: 52），固是矣，则予岂好辩也哉，予固不得已也。

参考文献

一、古典文献

- 班固撰，颜师古注1975a。《汉书·儒林传》。台南：平平出版社。
- ____1975b。《汉书·艺文志》。台南：平平出版社。
- 崔适1995。〈公羊传当正其名曰春秋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31册《春秋复始》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崔述1984。《洙泗考信录》。《丛书集成新编》（第六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 房玄龄等撰1974。《晋书·束皙传》（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
- 顾炎武1979。《原杪本日知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焦循注1987。《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 雷学淇2000。《竹书纪年》。《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三辑第十二册。北京：北京出版社。
- 黎靖德编1986。《朱子语类》（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
- 刘晔撰，李贤等注1971。《后汉书·郎顛传》（第三册）。香港：中华书局。
- 马小梅编1967。《国学集要初编十种》第二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复印件。
- 欧阳修2001。〈易童子问〉（卷三）。《欧阳修全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
- 阮元校刊1993。《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景本。
- 司马迁撰，泷川龟太郎注1993a。《史记会注考证·太史公自序》台北：文史哲出版。
- ____1993b。《史记会注考证·管晏列传》台北：文史哲出版。
- ____1993c。《史记会注考证·秦始皇本纪》台北：文史哲出版。
- ____1993d。《史记会注考证·儒林列传》台北：文史哲出版。
- 王聘珍注1983。《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
- 王先谦注1954。《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 魏征等撰1935。《隋书·经籍志》。《四部备要》（第68册）。上海：中华书局。
- 章学诚1980。《文史通义》内篇四〈言公上〉。台北：华世出版社。
- 赵善治注1986。《说苑疏证·尊贤》。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郑樵2000。《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引《子思子》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朱熹1999。《周易本义》。台北：大安出版社。
- 朱熹、吕祖谦编1935。《近思录》（卷三）。《四部备要》（第168册）。上海：中华书局。

二、近人论著

- 戴璉璋1989。《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台北：文津出版社。
- 冯友兰1933。〈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燕京学报》第二期。
- 高怀民1975。《先秦易学史》，台北：东吴大学。
- 顾颉刚1992。《古史辨》（第三册）。《民国丛书》（第四编第67册）。上海：上海书店。
- 顾实1987。《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韩自强2004。《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1997。《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
- 何泽恒2000。〈孔子与易传相关问题复议〉。《台大中文学报》第十二期：1-55。
- 黄寿祺编1987。《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 黄彰健1997。〈了解《论语》的方法，并简论汉宋学派对《论语》的解释〉。《周公孔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
- 李镜池1978。《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
- 李零1988。〈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九州岛学刊》3卷1期：105-136。
- 李学勤1992。《周易经传溯源》吉林：长春出版社。
- 廖名春2004。〈钱穆孔子与《周易》关系说考辨〉。《河北学刊》第24卷第2期：88-93。
- 林尹1981。〈易经要略〉。《易经研究论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 吕绍刚1997。〈易学与史学〉。《国际易学研究》第三辑。北京：华夏出版社。
- 吕思勉1996。〈经传说记〉（《先秦学术概论》附录二，上海：东方出版社：67-75。
- 钱穆1994。《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8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_____1999。《先秦诸子系年，孔子五十学易辨》三版。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单承彬2001。〈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为“鲁论”考〉。《文史》第3辑：47-56。
- 尚秉和1994。《周易尚氏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苏渊雷1985。《易学会通》。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_____1989。〈孔学四论〉。《中国思想文化论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 萧汉明1988。〈论杂卦〉。《周易研究》第2期：24-29。
- 徐芹庭1983。〈由孔子与易之深切关系纠正先贤及古史辩诸君之解〉。《孔孟学报》第45期：7-11，32。
- 徐威雄1996。〈试论太史公所说的“正《易传》”〉，未刊稿。
- _____2007。《先秦儒学与易系之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未出版）。
- 张岱年1979。〈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中国哲学》第一辑：121-143。
- 张心澄1991。《伪书通考》。《民国丛书》（第三编，第43册）。上海：上海书店。
- _____n. d.《伪书通考》（修订版）。香港：友联出版社。
- 张阴麟1982。〈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辨》（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郑吉雄2004。〈20世纪初《周易》经传分离说的形成〉。《大易集奥》（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朱晓海1986。〈今本易传与先秦儒学关系的再审〉。《东方文化》，第24卷第2期：125-148。